

都市
与文化
译丛

城市文化

The Cultures of Cities

包亚明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ron Zukin 著 张廷仝 杨东霞 谈瀛洲 译

城市文化

Sharon Zukin 著

张廷佺 杨东霞 谈瀛洲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 Sharon Zukin, 1995

The right of Sharon Zukin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First published 1995

Reprinted 1996, 1997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is book published by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s authorized by Blackwell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文化/(美)朱克英(Zukin, S.)著;张廷佺,
杨东霞,谈瀛洲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3
(都市与文化译丛)
ISBN 7-5444-0075-1

I. 城... II. ①朱...②张...③杨...④谈...
III. 城市-文化-研究-美国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615 号

都市与文化译丛

城市文化

包亚明 主编

Sharon Zukin 著

张廷佺 杨东霞 谈瀛洲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4 字数 230,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25 本

ISBN 7-5444-0075-1/G·0002 定价: 20.00 元

都市与文化译丛

包亚明 主编

Urban Studies

10

译丛总序

亨利·列斐伏尔作为“都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再强调空间问题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论视角。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主要不在于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

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了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

间—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进行重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市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大卫·哈维则将时间与空间的复杂交织命名为“时空浓缩”。

如果说，全球化对于都市问题的深刻影响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影响，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观念的巨变；那么，与全球化互为表里的消费主义，就必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加以讨论。消费主义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产品、消费市场所能涵盖的。鲍德里亚早在1968年出版的名著《物体系》中，就指出过：“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都不是消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讯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

统化操控活动。”(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台湾时报出版社,1997年,第221、222页)

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在此,我们重又回到了文化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当代日常生活的侵袭,并不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实现的,而是通过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可以说,消费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必然同时是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起主导的社会。在当代社会中,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取信息,而是坐在家让电视把社会生活的画面直接送到眼前,消费社会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媒体社会。的确,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情景戏剧、体育运动、谋杀案审理、快餐商业广告、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战争等都通过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庭。电视渗透的面是如此之广,影响又是如此之深,它对于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

生活空间,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受众和大众实际上是由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因为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塑造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直接把大众型塑为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大众接收各种各样的传媒内容时,只是为了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从而进一步消除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从而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

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在促成大众文化急剧扩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如果在传统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表现为知识分子是主动的观念传播者和灌输者,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话;那么,在大众文化与传媒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则表现为大众不再同知识分子相关,大众以“沉默”来对抗传媒的主宰和知识分子的统治企图。显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在整合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针对自身的批判机制。

当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内在联系也就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沙朗·佐京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也从城市发源,从城市生活复杂的特殊性和激发点上发源。如果说主流的社会科学视野和正统的科

学社会主义在阐释人类历史和社会时,已经日趋忽视这些空间特殊性的解码性潜力,那么现在则到了把这“隐没的维度”带回到画面上的时候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朗·佐京提出了“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问题。她认为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时也是由社会差别与城市恐惧引起的冲突的一个更为明显的场所。“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索亚则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型塑我们思想的文化观念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作为相当对立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与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但“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已经成为了当代人文社会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内在联系,我们才将本翻译丛书命名为《都市与文化译丛》。这是一套以介绍“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重要成果为目的的翻译丛书,它同时也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出版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完整的出版计划将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本套“都市与文化译丛”;一是“都市与文化丛刊”,目前已经出版了三期,它以发表都市研究与文

化研究论文和译文为主,其中部分译文是本译丛的一些先期成果;另外在时间与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将推出“都市与文化论丛”,主要发表关注本土问题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成果。希望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出版计划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工作。

包亚明

前言

这本书既有个人的历史，也有学术的历史。这是我女儿出生四年来我写的第一本书。我女儿伊丽莎白与我不同，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这个城市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一直试图跟她解释那些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通的小道理——为什么城市既伟大，又可怕——还有许多其他相关的、较小的秘密。为什么我喜欢坐公共汽车而不是地铁？为什么我们从不坐在地铁的最后一节车厢里？为什么艺术博物馆的花园里建有雕塑，而你却不能碰它们？与所有家长的故事一样，我的故事也充满了矛盾。有时候，在我作为一个城市的观察者，跟我作为一个母亲所教或所写的东西之间，甚至有着显著的矛盾。

例如，唐娜·哈拉韦在她《泰迪熊的父系政治》一文中对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立者们的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和包含标本动物的实景模型中所体现的傲慢的世界观进行了尖刻的解构。就在我与研究生们讨论这篇文章的那一个星期，我带伊丽莎白去了动物园。它的名字已改为“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在视觉上的展示也已反映了现在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但这些事实并没有让我对自己所扮演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感到舒服。我只好试图用写作来部分地解决这些矛盾。所以，本书也有一些其他父母所说的故事的缺憾，即想解释的太多，解释成了的又太少。

但有些矛盾却来自于今天的城市文化意义的改变。在最近几年里，文化已成为城市政治和政策的一个显著部分。“多元文

化主义”，随你的观点的不同，已成为社会包容与排斥的代名词，并已在公立学校教学内容与公共图书馆所购书籍方面引起了长久的争斗。城市居民传统上自夸的“宽容”气氛，已被装上了社会与文化“多样性”的避雷针。接受这种多样性，意味着你必须跟那些人们——他们显而易见地，很可能是相当热切地以你所不赞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分享街道、公园、学校和公共汽车等公共空间。原来被认为是可以增加一座城市的文明美誉的文化机构，如艺术博物馆，已被指责为“精英主义的”，并正处于“民主化”或重新定义的过程中。同时，这些机构的富有也受到了公共官员的称赞，因为它们强化了一座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的竞争力。当我们在看一幅凡·高的画，看到旅游者们所花的钱，当我们考虑到“文化”方面的社会阶级差异，当我们把市区的商业中心设计为“迪斯尼乐园”——那么我们正在进入城市文化的矛盾之中。

《城市文化》一书也产生于我对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现的物质方面的着迷。多年前，在我写作《阁楼生活》一书时，我试图阐明艺术对城市发展的极富诱惑力的影响。利用艺术家的工作室或阁楼来刺激房地产市场，提升房地产价格，是鼓励艺术事业产生的意外后果；但是跟在城市的艺术陈列馆、餐馆和美食商店里的不断膨胀的文化消费浪潮相联系，它是走向中产阶级化的第一步。都市规划者和艺术家对《阁楼生活》的类似反应鼓励我强调艺术在城市的政治经济中的象征重要性。随着制造业的不断移置，经济的金融与非赢利性部门的不断发展，文化生产似乎已越来越成为城市的目的了。

到我写《权力的地图：从底特律到迪斯尼乐园》一书的时候，北美城市已经更多地从传统物质商品的生产转向更抽象的

产品的生产：股票与债券，房地产，还有文化旅游业的体验。从为公司白领所居住的郊区的起伏山丘，一直到以新式烹调为标榜的中产阶级化的餐馆，城市与郊区的再发展，都越来越多地基于对社会同质性的视觉意象的控制。我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一切，促使我提出这样一个激进的观点，即消费在空间、工作职位、电视节目和文学意象之中的组织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已至少变得跟生产的组织同样重要。文化资本从它对社会的影响来说跟投资资本是一样的。

“地图”这一概念的运用，使我能够把注意力集中于社区，从工业城镇到后现代城市，并把它们同时视作物质的与象征的建构。当我继续思考城市的时候，我开始认为它们的经济已越来越多地建筑在象征生产的基础上。餐馆、博物馆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指向一种象征经济，它对工作、种族与社会分别、文化意象的物质影响，在以前是很难被想象的。

在《城市文化》这本书的设想产生之前，我曾作过一系列的演讲，其中暗含了象征经济的中心思想。1991年，在我为不来梅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所写的一篇论文中，象征经济已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早期纽约艺术市场的形态——即过度膨胀和社会恐惧的弱点。1992年，我在锡拉丘兹大学谈到了在北亚当斯——一座正遭受非工业化和高失业率之苦的城镇——建立马萨诸塞州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计划。大约在同时，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关于公共空间——从空置的店面到小区的商业街——如何因经济衰退而发生改变的又一演讲。我仍然继续对迪斯尼乐园的写作与思考，把它视作服务业的象征和某种类型的城市发展——有秩序的、得体的、把个人欲望置于公司控制之下的——的旗舰。我在加利福尼亚

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也谈到了这些问题。跟研究生们一起,我进行了一个把餐馆作为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空间的研究项目。最后,我思考了文化在公共空间——公园,艺术博物馆,城市的街道——里的再现,并意识到了公共文化如何通过这些空间竞争获得体验、设想和控制它们的权利来得到定义。在布莱恩特公园的设计与转化中集中了这些问题,而对此我在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学术会议上都谈到过。关于商业街上的自传和霸权这一章是我最后在1994年写成的。

路易·曼福德的经典著作《城市文化》所关心的问题跟我的大不相同,尽管他的书名启发了我。我们的著作都跟城市规划、民主和市场经济有关,但对我来说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已变得更加突出,更加问题化。

关于这本书的起源就谈到这儿。尽管这本书的思考过程是一个个人的旅途,但一路上我有过很多好的旅伴。

对第三章和第五章的合作者,我深表谢意。对这两章的构思和写作我承担主要责任,但亨特学院和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社会学副教授菲利普·卡斯尼兹进行了有关马萨诸塞当代艺术博物馆这一章的研究与初稿的主要部分的写作,而我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关于城市社会学的讨论课上的研究生,则作了关于餐馆这一章的全部研究和大部分的初稿写作。跟这些优秀的合作者共事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

对我的一系列研究助手:简·帕克、但尼·开斯勒和亚列克斯·维达尔,我也非常感谢。他们不仅和我同样对写成这部书感兴趣,他们对它的重要性的始终深信不疑,也让我感到鼓舞。

本书完稿后,我的朋友哈维·莫洛兹把它仔细通读了一遍,

使我受益匪浅。在城市研究的领域中,很少有像他这样综合了广博的学识和挑剔的审美品味的学者。哈维无疑挽救了书中那些最糟糕的错误;对那些次要的错误,我仍承担全部责任。

要是没有同事愿意倾听我那些犹犹豫豫的问题、不着边际的猜测,阅读几页我拿不准的书稿,并给予我鼓励,那么这本书也是不可能写成的。我从我的搭档赛沙·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是她跟我共同教了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客体、空间与视界”;还有普里西拉·福古森,她是我关于烹调的研究的忠实合作者;简尼特·沃尔夫、托尼·金、罗尔夫·梅厄孙、斯蒂夫·斯坦贝格、比尔·考恩布卢姆、乔治·坎宁安、鲍勃·维斯古西、赫伯特·甘斯、彼得·马库斯与托尼·舒曼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一个演示,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在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同事和学生们,从我敞开的大门走进我黑洞洞的办公室,总是见到我在一支 60 瓦的灯泡的照耀下不断地打字,可能还以为我在写一本伟大的著作。我希望这本书没有令他们失望。而不能跟我的同事弗农·伯格一起庆祝这本书的出版,让我感到难过;他是在我完稿后去世的。在我写作的时候,他一直是走廊里的一个友好伴侣。

写一本“由论文组成的书”的主意来源于克里斯·罗杰克,他原来在鲁特里奇出版社工作,现在已回到大学教书。所有接受过这样的主意的人,都了解要使这样的一本书有统一的主题与风格,要花多少的时间与精力。我在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的编辑西蒙·普罗瑟,拥有从事他这一职业的人所需要、却很少有的那种技巧与圆通。在等待这本书成形的过程中,他既表现出了勇气,也表现出了耐心。最终的成果得益于简·黎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的生产经理,她给我打了无数次的电话,跟我讨论版

式、字体以及 Kmart 当中是否该有一个连字号等问题。

当然,我必须向伊丽莎白和理查德·罗森表示最深的谢意,因为他们和我总是形影不离。当伊丽莎白把她的明信片和玩具摊在餐厅的地板上,说她在“建博物馆”,或者用她的玩具碗碟和塑料食物来“开咖啡馆”的时候,我想,他们和我的生活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

纽约市

1994 年 10 月